

# 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回顾与思考

薄明华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汶川大地震期间, 中国思想界围绕着“普世价值”是否存在, 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是否是“普世”的价值, 中国改革开放是否是向“普世价值”回归, 抗震救灾是否彰显了“普世价值”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关于“普世价值”争论具有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 它凸显了当前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巨性, 也凸显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紧迫性。

**关键词:** 普世价值; 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6-0072-05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期间发生的“普世价值”全民大辩论历时数月之久, 如今已归于平静。认真梳理这次争论的来龙去脉, 从而反思争论中反映出来的深层次问题,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普世价值”争论的来龙去脉

中国思想界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已久。20 世纪 90 年代, 在全球经济、文化日益呈现一体化趋势的背景下, 一些宗教组织发起了一个“走向全球伦理”的运动。著名的德国神学家孔汉思在 1989 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提出, 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 便没有各民族间的和平。1991 年, 美国天普大学宗教系主任、普世研究所所长斯威德勒教授发出一份呼吁书, 号召起草全球伦理宣言。这份呼吁书得到了很多神学家和学者的回应。1993 年 9 月, 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创始性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界定了全球伦理的内涵: “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 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 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 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 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 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 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

绝望。”按照孔汉思的解释, 这样一种全球伦理应当是“由所有宗教肯定的、得到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sup>[1]</sup>1997 年和 1998 年, 中国学者两次聚会北京, 对全球伦理的倡议做出积极响应。中国学者围绕“有没有全球伦理”“促成全球伦理有何意义”“能否促成全球伦理”以及“如何促成全球伦理”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国内学者使用的“普世价值”概念就是从“普遍(全球)伦理”概念演化而来的。1996 年郭洪纪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题为《儒教文明的普世价值与特殊主义取向》的文章。此文是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第一篇标题含“普世价值”的论文。随着“普世价值”概念的广泛使用, “普世价值”从伦理视域中深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对“普世价值”的讨论也从学术层面拓展到了政治层面。政治层面的“普世价值”的讨论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1999 年, 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与自由主义学者代表人物袁伟时进行了一场针对“五四”运动的专门对话, 对话中二人均认为, 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都属于“放诸四海皆准的基本价值”。这个对话以《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为题在《开放时代》刊出。2005 年袁伟时在《炎黄春秋》发表《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一文认为, “以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 WTO 为标志, 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 中国政府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 各国“不应以多元文化为藉口, 抗

收稿日期: 2011-07-05; 修回日期: 2011-10-21

基金项目: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 10YJC710001); 中南大学第十八批博士后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薄明华(1974-), 女, 河南南阳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拒普世性的核心价值”，“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都与是否接受这些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sup>[2]</sup>自由主义学者李慎之、刘军宁、朱学勤、谢泳等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李慎之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sup>[3] (242)</sup>此后，“普世价值”问题在一些立场相左的学者中时有小范围的辩论。从2007年秋天起，《南方周末》陆续推出一批宣扬“普世价值”的文章，如《什么是普世价值》《立足民族特色拥抱普世价值》《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等，“普世价值”观开始扩散、传播。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一篇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文章写到，“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文章最后写到：“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这篇文章成为点燃关于“普世价值”全民大论战的导火索。6月6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东方明亮”的批判文章《普世价值不得乱套》。作者认为：“在《南方周末》的眼中，奋战在抗震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他们所做的一切，原来是由于‘普世价值’的作用”。与此同时，以司马南为代表的“普世价值”质疑者，在网上借助博客和论坛(如强国论坛、乌有之乡)，发表了数百篇批判文章，如“《南方周末》舞‘普世’剑，意在沛公”(司马南)“过而不改，恶莫大焉——司马南致《南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普世价值’凭什么在中国地震中抢功”(郑华淦)“我象害怕‘仁义’道德那样害怕普世价值”(数学)“普世价值想干什么”(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向西流)“普世价值背后的阴谋”(剑云拨雾)等。2008年7月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社科院改革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200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虞章的批判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9月19日《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与《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普世价值”问题学术研讨会。冯虞章、刘书林、周新城、郝立新、焦国成、王一程、陈红太、郑一明等20多位学者围绕“普世价值”问题的实质、“普世价值”思潮出现的过程及原因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了研讨。随后，一批著名学者在《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学习时报》等权威杂志相继发表了更多的批判文章。如《关于普世价值的随想》(周新城)《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李崇富)《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陷阱》(侯惠勤)《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张维为)，等等。在这场论战中，尤其在互联网上，双方观点针锋相对，言词激烈、异常活跃。由于种种原因，这场激烈论战现已归于平静。

## 二、“普世价值”争论的焦点

笔者认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焦点有以下几个问题：“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是否是“普世”的价值？中国改革开放是否是向“普世价值”回归？抗震救灾是否彰显了“普世价值”？等等。

### (一) 是否存在“普世价值”

是否存在“普世价值”是双方争论的逻辑起点。支持“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学者大都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邵建认为，人作为一个类，注定了他们之间的类同性。符合这些类同性的人类价值，便呈现出它的普世性。因此，普世价值承认与否，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拒绝普世价值，如同自拒人类。<sup>[4]</sup>杜光也持类似观点：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sup>[5]</sup>

反对“普世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出发，认为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价值不可能存在。冯虞章认为，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也站不住脚的。<sup>[6]</sup>周新城认为，价值观念从来都是具体的，抽象的共同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独立存在。鼓吹

“普世价值”的人往往把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群存在的价值观念中的共同点,抽象出来把它叫做“普世价值”。<sup>[7]</sup>李崇富认为,目前,在当今的作为整体的世界还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普世”的、超阶级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直至阶级完全消灭为止,凡是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和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sup>[8]</sup>

## (二)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是否是“普世”的价值

关于什么是普世价值,争论双方都没有对此作明确的界定,都将之作为不言自明的概念。正如徐迅雷所说:什么是普世价值,当然没有定论和论定。大致可以说,普世价值是具有永恒的、普世性的价值,是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论的核心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是否具有普世性。自由主义学者认为,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样一些制度范畴不仅是人类获取自尊、独立和富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福利的组成部分。这些制度范畴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sup>[9]</sup>自由、人道、民主、平等等价值代表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基本区别。这些价值尽管首先出现在西方,但它们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或专门财富,而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是举世公认的、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道德规范,是最高层面的道德范畴。

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的。而那些宣扬“普世价值”的人,正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推销西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概念(名)具有普遍性、共性和一般性,但是其内涵(实)却是特殊的、个别的、具体的,是因人、因阶层、因阶级、因民族、因国家、因时代而异的。正是在具体内容不同这个意义上说,根本不存在“普世”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sup>[10]</sup>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定的核心价值体系。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所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不具有普世价值,它们都表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价值取代了过去的反共大旗,西

方竭力甚至强行在当今世界推销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到普世价值,动机十分令人起疑。<sup>[11]</sup>

## (三) 中国改革开放是否是向“普世价值”回归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自由主义学者将普世价值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宣称改革开放是向“普世价值”的回归,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不再是游离于普世价值之外的国家。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要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正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改革开放三十年,正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真正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普世价值不应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中国要瞄准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所确认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迈开前进步伐,坚决地将中华民族融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sup>[9]</sup>

反对方认为,党的十七大概括和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已经明确回答了党在改革开放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功。那些鼓吹“实行改革开放必须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承认普世价值,同世界文明接轨”是企图用所谓“普世价值”误导我国的改革方向,力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普世价值”论者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sup>[12]</sup>

## (四) 抗震救灾是否彰显了普世价值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强烈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在这次赈灾行动中,政府的迅速反应,军队的英勇救助,对国际援助的开放,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日,全国范围的下半旗和三分钟默哀……。对此争论双方都给予了正面但又不同的评价。“普世价值”论者认为,“灾难唤醒了普世价值”。尊重生命、保障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13亿中国人

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对生命的关爱。灾区人民也以自己顽强抗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向世人宣示了他们对生命的态度。这场感动天地的生死大营救诠释了关爱生命的普世价值。“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sup>[13]</sup>“中国在抗震救灾中诠释普世价值”“抗震救灾是普世价值的胜利”。

反对者则认为，中国人民的抗震救灾精神不容“普世价值”鼓吹者曲解。网民质疑，在地震灾难面前，我们表现出以人为本、“仁义”至上、互助友爱的精神，这和西方普世价值何干？我们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为何非得要扯上西方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素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一盘棋”的优势，这为何也得与西方的普世价值联系在一起？普世价值怎么打起抗震救灾的主意来了呢？怎么将中国人民的抗震精神和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一律诠释成西方普世价值之花结出的果呢？有网民指出，如果在“普世价值”指导下抗震救灾，我们决不能产生像谭千秋这样的流芳千秋的师德师魂，而只能产生更多的“范跑跑”，更不可能有这样举世惊叹的感人事迹。抗震救灾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胜利。决不是普世价值的胜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这场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样要靠党的领导。<sup>[14]</sup>

### 三、对“普世价值”争论的反思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和整个媒体界最重要的争议话题之一。这场争论引起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从平面媒体到互联网、从平民百姓到领导层无不涉入了这场争论。如今争论虽已平静，但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 （一）“普世价值”争论的出现具有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在国内，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革，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在国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活跃。社会主义中国将长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价值渗透的压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2008年中国共产党在抗震救灾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海外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讨论西方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劣问题，不少文章提出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可是，在一些国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看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威胁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威胁他们的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所以他们总是寻找机会、变换手法对中国发难。国内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附和国外敌对势力，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鼓吹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中国不应当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自外于这些普世价值。在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中，少数人甚至借助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打着“普世价值”旗号推销其政治主张，主张用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影响中国今后改革开放的走向。

#### （二）“普世价值”的争论凸显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巨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摆脱贫困落后，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少以前未曾显现的矛盾和问题，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凸显出来。尤其是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加剧了人们之间不平等感，影响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虽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强调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但是，正如有人所说，“普世价值”像是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混沌中的中国社会分裂为两个清晰的水火不能交融的立场阵营”。从双方言辞之激烈、观点之迥异看得出，这场“普世价值”全民大论战决非是简单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场基于利益差异之上的根本立场对立。人的一切行为皆根源于利益。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利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利益关系合理，人们各得其所，舒畅气顺，才会有和谐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要和谐和发展，就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理顺人们利益关系的过程、是一个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过程。

### (三) “普世价值”的争论凸显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在这些思潮中,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方向比较一致的进步思潮,有鼓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潮,也有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动思潮。现实告诉我们,多样化社会思潮既是无法避免的,又是必须加以引领的。如果任其自由发展,那就会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冲击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影响和冲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目标取向,甚至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来团结群众、凝聚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反映着时代特征。它鲜明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只有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路径,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才能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总目标下,不断增进社会思想共识,不

断强化全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也才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美好理想变为举国上下的一致行动。

### 参考文献:

- [1] 李战奎. “普世价值”研究述评[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3): 1-6.
- [2] 袁伟时.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J]. 炎黄春秋, 2005(2): 68-71.
- [3] 李慎之, 何家栋. 中国的道路[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0.
- [4] 邵建. 拒绝普世价值, 如同自拒人类[N]. 现代快报, 2008.
- [5] 杜光. 普世价值: 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J]. 炎黄春秋, 2009(1): 4-7.
- [6] 冯虞章. 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7): 104-109.
- [7] 周新城. 关于“普世价值”的随想[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9): 25-28.
- [8] 李崇富. 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9): 17-20.
- [9] 党国英. 立足民族特色拥抱普世价值[J]. 南方周末, 2007.
- [10] 郝立新. 认识“普世价值”问题应注意区分几个层面[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8(11): 7-8.
- [11] 宋郑鲁. 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J]. 红旗文稿, 2009(3): 1-4.
- [12] 侯惠勤. “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陷阱[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9): 20-25.
- [13] 本报编辑部. 汶川震痛, 痛出一个新中国[N]. 南方周末, 2008.
- [14] 郑华淦. “普世价值”凭什么在中国地震中抢功[N]. 强国论坛, 2008.

##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Argument of Universal Value

BO Minghua

(Marxism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period, Chinese academe had a heated debate on the Universal value. The arguments of Universal Value originated from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which indicates the challenge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urgency of the socialism core value system for leading the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

**Key Words:** universal value; socialism core value system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

[编辑: 颜关明]